

从古书考中国唐朝与堕罗钵底国之交流

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ราชวงศ์ถังกับอาณาจักรทวารวดีในบันทึกเอกสาร
โบราณของจีน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Tang Dynasty and Dvaravati Kingdom
from Ancient Books

เมษา มหาวรรณ และ หทัยรัตน์ มหาวรรณ
Mesa Mahawan and Hathairat Mahawan

ภาควิชาภาษาตะวันออก คณะมนุษยศาสตร์และสังคมศาสตร์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mail: maysah_mah@cmru.ac.th, hathairat_mah@cmru.ac.th

【摘要】

堕罗钵底国是以泰国湄南河下游为中心而建立的古国。公元六至十一世纪左右，由孟族所建立。唐代之史料所载，堕罗钵底国之名称并不一致，有堕罗钵底、投和国、杜和钵底、堕和罗等名。唐·贞观年间，堕罗钵底国曾朝贡中国。除了朝贡和贸易关系以外，中国唐朝与堕罗钵底国佛教文化交流也很密切。

【关键词】 堕罗钵底国 唐朝 交流 朝贡 佛教

บทคัดย่อ

อาณาจักรทวารวดีเป็นอาณาจักรโบราณที่มีศูนย์กลางตั้งอยู่บริเวณลุ่มแม่น้ำเจ้าพระยา เชื่อว่าเป็นอาณาจักรของชาวมอญที่ปรากฏอยู่ในราวศตวรรษที่ 6 ถึงศตวรรษที่ 11 ในบันทึกเอกสารโบราณของจีนสมัยราชวงศ์ถังได้มีการจดบันทึก 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พระราชพงศาวดารราชวงศ์ถังทั้งฉบับเก่าและฉบับใหม่จดหมายเหตุ หรือหนังสือเอกสารต่าง ๆ ล้วนได้บันทึกเกี่ยวกับการไป

มหาสมุทรระหว่างทั้งสองราชอาณาจักรทั้งการเจริญทางพระราชไมตรีด้วยการ
ถวายเครื่องราชบรรณาการ จมก้อง และการติดต่อค้าขาย นอกจากนี้ยังมีการ
ติดต่อ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ทางด้านวัฒนธรรมและพระพุทธศาสนาอีกด้วย

คำสำคัญ: อาณาจักรทวารวดี ราชวงศ์ถัง ติดต่อแลกเปลี่ยนจมก้อง
พุทธศาสนา

Abstract

The Dvaravati Kingdom is an ancient country built by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o Phraya River. AD six to eleven century or so, the Kingdom was established by the Mon nationality. Tang Dynasty historical data contained in the name of Dvaravati Kingdom is not consistent. It includes Duoluobodi Kingdom, Touhe Kingdom, Duhebodi Kingdom, Duoheluo Kingdom, and other names. In addition to tributary and trade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Buddhism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and Dvaravati Kingdom was also very close.

Keywords: China Tang Dynasty, Dvaravati Kingdom, Ancient Books

唐朝时期的中国，同亚非地区许多国家有广泛而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这不仅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而且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唐朝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隋唐代时期，中外交往异常频繁。很多东南亚国家都与唐朝有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各国使节、贵族、商人、学者、艺术家、僧侣、旅游者等不断来到中国。唐朝的使臣、僧侣、商人，亦不绝于途。墮罗钵底国也是其中之一。

公元六世纪以后，古代扶南国（相当于中国的隋唐时期）开始衰落，孟人在湄南河下游建立起了墮罗钵底王国，在现今泰国的佛统府（NakhonPhathom）一带。该国的前身就是泰国历史上最早的两个王国——

金邻国和林阳国。这是泰国海湾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地域广阔，经济文化发达，统治着泰国湄南河下游以佛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当时中国隋唐的学者和僧侣已经知道这个以佛教文化而闻名的国家，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记载。

唐朝名僧玄奘与贞观初年（公元 627 年）西行求法，将沿途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这是一本关于西域和古印度的地理和历史著作。全书 12 卷，约 13 万字，共记述玄奘西行亲历或得自传闻的近 130 个城邦、地区和国家的概况。其中卷十三摩咀吒国条就提到了堕罗钵底国。玄奘本人未必亲临此国，他是在当时的佛教中心——印度获知这个国家的。这说明这个国家的佛教文化十分发达，并和印度有交往。

唐朝另一位高僧义净于公元 671 年从广州出发，经海路到达印度，在那烂陀寺学习了 10 年，后于公元 695 年返回洛阳。义净的著作《南海寄归法传》也提到“杜和钵底国”。该书卷 1 东裔国注说：“从那烂陀东行 500 驿，皆名东裔，乃至穷尽，有大黑山，计当吐蕃南畔。传云：蜀川西南行可一月余，便达此岭，此次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咀罗国，次东南有郎迦成国，次东有杜和钵底国，以东极至临邑国。”由此可见，杜和钵底国无论从海路或陆路都可以分别和印度、中国相连，并处于这两个文明古国的交汇点上，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印度和中国两种文化的影响。

除此而外，《旧唐书》有堕和罗国传。《新唐书》有投和国传。《太平御览》卷七八八有投和国条。杜佑《通典》卷一八八有投和传。

上述种种称呼，无论是堕罗钵底，或是杜和钵底、堕和罗、投和等，统统都是指同一个地方，即巴利文 Dvaravati 的同音异译。Dvaravati 在巴利文中的原意是“门户”，常用于口岸城市。这里被用来作为国家政权的名称，可见它作为近海的外贸口岸城市的重要地位。

堕罗钵底国是孟族建立的国家。孟族是孟-吉蔑族（Mon-Khmer）的一个分支。在泰国境内许多地方都发现古孟文碑铭，例如公元 6-7 世纪的孟文碑铭在佛统、洛坤和华富里各发现一块。公元 10-11 世纪的孟文碑铭在乌泰他尼府、罗斛地区、那空沙旺府、孔敬府、胶拉信府、吗哈

沙拉堪府有发现。公元 11-12 世纪的孟文碑铭在泰国北滨河流域的喃奔府和缅甸蒲甘王朝南部发现。公元 13 世纪的孟文碑铭在泰国南洛坤的锡兰普提寺发现。由此我们确定，使用孟语的民族遍布整个堕罗钵底国，他们由海滨的口岸城市逐步向内陆城市发展，他们创造了辉煌的堕罗钵底式的文化艺术。

关于堕罗钵底国的情况，以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最为详尽，这是研究堕罗钵底国历史的主要文字依据。唐朝杜佑《通典》卷一八八投和国传说：

投和国，隋时闻焉。在南海大洲中，真腊之南，自广州西南水行百日至其国。王姓投和罗，名脯那乞遥。理数城。覆屋以瓦，并为卜而居。屋壁皆以彩画之。城内皆王宫室，城外人居可万馀家。王宿卫之士百余人。每临朝，则衣朝霞，冠金冠，耳挂金环，颈挂金涎衣（涎，序连反）。足履宝装皮履。官属有朝请将军，总知国政。又有参军、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将军、赞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县。州有参军，郡有金威将军，县有城局，其为长官，初至，各选官寮助理政事。刑法：盗贼多者死，轻者穿耳及鼻并钻鬢，私铸银钱者截腕。国无赋税，俱随意贡奉，无多少之限。多以农商为业。国人乘象及马。一国之中，马不过千匹，又无鞍辔，唯以绳穿颊为节制。音乐则吹蠡、击鼓。死丧则祠祀器泣，又焚尸以罌盛之，沈於水中。若父母之丧，则截_口为孝。其国市六所，贸易皆用银钱，小如榆荚。有佛道，有学校，文字与中夏不同。讯其耆老，云：王无姓，名齐仗摩。其屋以草覆之。王所坐塔，圆似佛塔，以金饰之，门皆东开，坐亦东向。唐贞观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献金_口（苦盍反）、金镇、宝带、犀、象、海物等数十品。

从上述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堕罗钵底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情况。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国王之下有一个完整的官僚系统。朝请将军总管国政，相当于总理大臣的职务。下设参军、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将军、赞理、赞府等官，分理文武。当然，这些官名都是中国意译，难免有附会之处。如果真是称为“参军”、“功曹”、“主簿”等，则跟唐朝的官衔完全一致了。



堕罗钵底国与中国唐朝关系

堕罗钵底国与中国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隋代（公元 581-618年）就已经有中国人到达堕罗钵底国地区了，但两国政府间的正式往来则始于唐贞观年间（公元 627-649年）。《通典》卷一八八投和传说：“自广州西南海行百日乃至其国… … 其国市有六所，贸易皆用银钱，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学校，文字与中夏不同。”大唐贞观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献金榼、金锁、宝带、犀、象、海物等数十品。”可见唐朝时堕罗钵底国与中国广州海上交通和朝贡贸易关系甚为频繁。

《新唐书》卷二二二则云：“贞观时，并遣使者再入朝，又献婆律膏，白鹦鹉，首有红毛齐于翅，因乞马、铜钟，帝与之。”《通典》和《新唐书》所及堕罗钵底国使者送来的礼物不尽相同，且《新唐书》有“遣使者再入朝”的说法，说明唐贞观年间堕罗钵底国起码两度派使节来中国。

堕罗钵底国赠送给中国犀是一种享有盛名的珍贵动物，犀角可以入药，亦可用来制造名贵的杯盘器皿。刘恂《岭表录异》说：

又有堕罗犀，犀中最大，（角）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犀，额上有心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为胯具，斑散而浅者即制为杯盘器皿之类。

但是，堕罗钵底国地区素来缺马，“一国之中，马不过千匹”。所以堕罗钵底国的使者来向中国要马。碰巧唐太宗亦是一位爱马的人，他曾收罗了天下的多良种马，其中最著名的六匹称为六骏马，被制成浮雕，即昭陵六骏，后被西方人盗去，现存美国博物馆。我们虽然无法知道唐朝究竟送给堕罗钵底国多少匹马，但堕罗钵底国曾从中国引进良种马，这一事实当是没有疑义的。

上述我们可见那时候堕罗钵底国与中国唐朝的朝贡与贸易关系比较频繁。

关于朝贡关系。朝贡本是中国古代诸侯定期朝见天子，贡献方物，表示诚敬的一种制度。《礼记·王制》：“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按郑玄的解释，每年派大夫来称为小聘，隔三年使卿来称为大聘，隔五年诸侯自己来称为朝。到了后来，朝贡已经不是最

初的含义了，它变为海外诸国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模式。海外诸国派使节到中国朝贡，中国政府派官员到海外抚夷，实际上是政治交往的一种外交手段，经济互利的一种官方贸易形式，人员和文化交流的一条重要途径。海外诸国名义上承认中国为上邦，中国视其为属国。但在实际上海外诸国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中国的支配和干涉。它可以借助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调整它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抵御外来的侵略。因此，海外诸国想与中国建立和保护朝贡关系非易事，往往提出请求后，必须受到中国政府的多考察后方才认可。而历代中国政府，也很重视外国来贡，每次都要命史官记录在案。所以，检索朝贡记录，便知两国间的友好交往。

除了朝贡和贸易关系以外，中国唐朝与堕罗钵底还有佛教文化交流关系。

堕罗钵底时期的经济繁荣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兴盛与传播，因而佛统自古以来一直是泰国的佛教文化活动中心。关于中国唐朝与堕罗钵底国佛教文化交流如下文献记载。

唐朝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有所提及，但遗憾的是玄奘法师终因“山川道阻，不入其境”，未能留下记录。所幸义净法师在《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对当时的泰国佛教有所记录。义净法师在其书中称堕罗钵底为“杜和钵底国”，如说“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咀罗国，次东南有郎迦戍国，次东有杜和钵底国--并悉极遵三宝，多有持戒之人。乞食杜多，是其国法。”其中的郎迦戍国就是泰国境内的狼牙修国。唐朝不少僧人曾游历过当时泰国的一些邦国，如成都义朗法师等曾“越舸扶南，缀缆郎迦戍，蒙郎迦戍国王待以上宾之礼”。此外，当时洛阳的义辉、荆州江陵的道琳都曾经过泰国本土前往印度问学求法，而义辉法师因患疾病客死郎迦戍国。其中义净法师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还提到了中国唐代爱州人大乘灯禅师在杜和钵底国出家求法的事迹。新旧《唐书》称当时的泰国为“堕和罗”或“投和”。杜佑《通典》中说投和“有佛道，有学校。--王所坐塔，圆似佛塔，以金饰之，门皆东开，坐亦东向。”公元638年和649年，堕罗钵底曾派使臣访问唐朝长安，交换两国国君的书

表，使者受到了大唐帝国的热情接待。

有关堕罗钵底国的记载主要见于中国隋唐时期的文献。到了宋代，只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三二二有投和传，但文字完全照抄唐朝杜佑的《通典》，没有新内容补充，可能这个国家到了宋代就不存在了。

堕罗钵底国在泰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主要反映在，它是泰国中部的一个文明发源地。它汲取了印度和中国两种古老东方文化的营养，创造了被称为堕罗钵底式的文化艺术，这是一种属于泰国自己的具有强烈民族色彩和时代精神的文化艺术。

结语

本篇文章由于资料方面的残缺，所以还有一些堕罗钵底与中国唐朝的关系没有被详细介绍。堕罗钵底在两个文明古国的交汇点上，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印度和中国两种文化的影响。堕罗钵底国与中国唐朝的关系。除了朝贡和佛教文化的交流外，其贸易往来也十分频繁。

参考文献

- 谢光.(1997).《泰国与东南亚古代史地丛考》.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 贺圣达.(1996).《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
- 段立生.(2004).《泰国文化艺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介南.(2002).《中外文化交流史》.北京：书海出版社.
- ต้วน ลี แซ็ง. (2540) 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ไทยในสายตาชาวจีน. (พิมพ์ครั้งที่ 2).
กรุงเทพฯ: สำนักพิมพ์พิราบ.
- Nie Dening. (2002). Interflow of Buddhist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sui & tang periods.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11(3),1-7.
- Zhuang Guo. (2005) .On the illusiveness of tributary system: A case of the tributary relating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23(3),1-8.

